



● 作者/Lowell Dittmer ● 譯者/黃文啟 ● 審者/黃依歆

# 論美「中」關係分歧 與未來發展

A Prognosis of the Current  
Sino-American Malaise

取材/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網站專文(*The Asan Forum*, August 31/2018)

川普政府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直言，「中共想要形塑一個與美國價值和利益背道而馳的世界。」(Source: White House)



美「中」關係到了2018年時已經嚴重惡化，使執政者與專家學者開始重新思考昔日關係的假定，本文認為當前美「中」關係低潮歸究於權力政治與各項認知問題這兩大因素，也因此導致雙方漸行漸遠，而近期發生的貿易戰也會迫使其他國家開始選邊站。





當前美「中」關係一直被知名中共問題學者描述為雙方自1979年關係正常化以來最糟糕的時候。<sup>1</sup> 未來情況還會多差呢？當然，這個問題最直接的答案，是未來無人可以預料。這樣的說法有其道理，故本文將聚焦於三個與問題相關並以較實證方式來回答。第一，雙方關係目前有多差？第二，導致雙方疏離的主要因素為何？第三，就當前各項趨勢而言，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何合理預判未來情勢發展？

### 當前狀態

美「中」關係長期一直處於非盟友亦非敵手的灰色地帶。儘管如此，在戰略和經濟上，這兩大支柱過去多年來似乎已建立起堅實的友誼。尼克森總統於1972年完成破冰訪問後的十年間，雙方關係完全立足於戰略基礎之上：兩者都認為需要彼此來嚇阻蘇聯的威脅。在戈巴契夫時代美蘇開始從緊張對立漸趨緩和，尤其是在1991年12月蘇聯瓦解後，此一美「中」共同戰略威脅亦隨之消失。中共不再需要利用美國延伸式嚇阻對抗蘇聯的先制打擊，而美國也不再需要「打中共牌」。在後冷戰時期的戰略大棋盤重新布局裡，中共的地緣核心性仍使其持續擁有戰略重要性，只是不再被視為核心支柱而已。隨著鄧小平重新掌權，並於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宣布「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共的經濟開放取而代之成為美「中」合作的新基礎。此種經濟關係具有彼此互補的效果——中共需要資金和先進科技，而美國需要廉價消費商品以抑制通貨膨脹，因此雙方的貿易與投資急遽升溫。美國商業界開始熱切投入

中國大陸市場，甚至還全力動員封殺柯林頓總統在1993至1994年企圖凍結中共「最惠國」待遇，柯林頓意在藉此迫使中共(未言明)進行人權改革。此種互利關係在中共2001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更是加速成長(儘管是不對等的)，因為透過「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建立，中共似乎將不再遭遇任何制裁的威脅。此舉不僅大幅降低中共的貿易障礙，同時加速其內部市場的自由化。人權運動分子和意識形態反共者的論調不敵政經聚合理論：正如同先進資本主義在當代福利國家中融合了社會主義的特徵，中共也接受了資本與勞動市場、公司企業組織和西方消費主義思想，最終演變成某種形式的民主選舉制度，如同中共的其他東亞鄰國一樣。

美「中」關係到了2018年時已經嚴重惡化，促使執政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考昔日聚合模式的各種重要假定。當美俄關係因為俄羅斯疑似介入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而急遽惡化，中共不但已失去扮演制衡俄羅斯的角色，還成為莫斯科當局的堅定支持者。在亞洲，中共過去配合落實各項制裁方案，顯然是迫使北韓在新加坡峰會中宣誓將推動朝鮮半島無核化的重要因素，但美國對於習金會內容仍頗有微詞，因為習近平採取強硬談判立場來支持分階段緩慢的無核化程序。於此同時，中共強勢聲索海上主權和推動建立新的區域安全秩序，都顯示其並不接受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勢力。<sup>2</sup> 2018年5月，中共在攸關東亞與東南亞安全的廣大海域通道上，占領各個島礁進行填海造陸和軍事化作為，使其「已能在不跟美國全面開戰的所有情況下掌控整個南海水域。」<sup>3</sup> 因此，



美「中」領導人在2017年4月於佛州海湖莊園舉行領袖會面時，其中降低貿易赤字談判成為新的迫切議題。

(Source: Reuters/達志)

不同於歐巴馬政府2015年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樂見「一個穩定、和平及繁榮的中共崛起」並致力「發展雙方建設性關係」，川普政府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直言「中共……想要形塑一個與美國價值和利益背道而馳的世界。」中共在世界事務上承擔「利害關係人」的角色，是華府一向鼓勵的行為，但其卻不只是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既有論壇享有更大的影響力，而且還創造出多個與舊有體系相抗衡的新組織，諸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野心勃勃的「一帶一路計畫」，希望以高達1兆美元計畫推動整個歐亞地區的高速公路、鐵路、港口及其他基礎設施的建造和升級，以創造中國大陸經濟之財富並協助其70個鄰近的貿易夥伴，該項計畫還具有軍事面

向的價值，而非僅止於保護獲得合約建造各種基礎設施的中國大陸企業。

雖然此種蓬勃發展的雙邊經濟關係為世界最大規模(占全球貿易的40%)，但真能完全消除美「中」關係的任何嚴重分歧嗎？愈來愈多人對此存疑。雙邊貿易赤字到2017年時已高達3,750億美元(依美方數據)，已是目前世界上最龐大的雙邊貿易赤字，而如何消弭該現象就成了川普的優先目標。美「中」領導人在2017年4月於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Mar-a-Lago)舉行高峰會時，降低貿易赤字談判成為新的迫切議題，儘管中共在會後減少整體貿易順差，雙邊赤字問題的嚴重性仍是持續攀升。<sup>4</sup> 中共方面的貿易順差當然來自於出口產業，而此一額度有約半數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外商投資企業(特別是高科技產業)，這點似乎為



中共與西方世界經濟合作提供了名正言順的立足點。<sup>5</sup> 然而川普在2018年春季投下宣布對中共展開貿易制裁的震撼彈後，卻未招致當年曾阻撓柯林頓總統將貿易作為人權談判籌碼的外商投資企業界強烈抗議。一如中共2025年現代化計畫之初步內容，北京當局目前希望設法降低對西方世界的科技依賴，而外商投資企業也遭遇到諸多官僚體系和法規方面的障礙。2013年11月時，中國大陸境內約有5萬7,200家外商投資企業，此一數字到了2016年11月時約減少10%：這些結束營業或自中國大陸境內遷移至他處的製造商，包含尼康(Nikon)、日東電工(Nitto)、三星集團(Samsung)、奧林巴斯(Olympus)、歐姆龍(Omron)、愛迪達(Adidas)、優衣褲(Uniqlo)、富士康科技集團(Foxconn)、英特爾(Intel)、樂金集團(LG)和諾基亞(Nokia)等。<sup>6</sup> 外國企業的固定資本投資額從2011年5,087億美元，劇降至2017年2,146億美元，六年內降幅高達57.8%。儘管固定資本投資仍是中共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的主要動

力，但其固定資產投資不斷大量填補出走的外國直接投資，而外國直接投資自2011年以來已增加為三倍。<sup>7</sup> 美「中」所舉行的大量雙邊會談，至今仍無法在中共調整自身的東亞戰略角色或是在中共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等兩方面達成共識。

儘管有上述堪憂的政治趨勢，但雙方在社會經濟方面的關係仍然相當密切。在近期雙方緊張情勢升高前，美國民眾對中共的好感度民調雖未達多數認同，但卻諷刺性的有所改善，從2016年37%美國人對中共有好感，提升至2017年的44%(無好感度則分別為55%和47%)。<sup>8</sup> 在2016至2017學年度，約有13萬名陸籍留美研究生。中共對美國直接投資在2016年已大幅增加至460億美元，直到2017年才急遽下滑。在不到十年間，中國大陸觀光客在美國的消費額成長四倍以上，每年超過200億美元。雖和中共輸入美國金額相差甚遠，但美國對中共的出口(尤其是農業和原物料)，在川普對中共加徵關稅前，仍然比美國出口至世界其他市場的成長速度快得多。

### 導致不滿的因素

美「中」關係對立的因素有兩個，但任一因素都不是充份及必要的條件。第一個是戰略問題，即俗稱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或是「權力轉移理論」。<sup>9</sup> 如同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所述，在20個歷史案例中有16個，都是因為既有強權受到新興強權挑戰而導致霸權爭奪戰。直到2010年左右，美國都還不認為中共是個威脅，因為兩者之間的落差大到根本無足顧慮，還因為中共以「韜光養晦」和「和平發展」論調小心翼翼地避免挑戰美國利益。不過權力轉移理論並無法準確說出美「中」關係，不僅無法確定雙方是否會爆發霸權爭奪戰(雖有80%的機率)，也不知道究竟誰會挑起這場戰爭，以及何處為雙方引爆點。然而，全球金融危機確實是以驚人速度顛覆全球權力平衡的主因。北京當局以5,860億美元的融資促進方案幫助國營企業得以在該次危機中存活，以沒有任何一年經濟負成長的成績挽救了中共經濟。這點對於兩大經濟體具有



美「中」關係對立的因素包括戰略問題與迥異發展軌跡。圖為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於2018年8月3日在新加坡舉辦的東協高峰會與中共外交部長王毅會面。(Source: State Department)

重大的差異性影響。在2007年金融風暴發生前，美國國內生產毛額為14.48兆美元，而中共僅有3.49兆美元；到了2014年，美國國內生產毛額為16.77兆美元，而中共則提高到9.24兆美元。換言之，中共國內生產毛額從原本只有美國24%，在短短七年內成長到美國55%。中共國內生產毛額更在2010年超越日本，到2015年時已超過日本的兩倍(中共為10.4兆美元；日本為4.12兆美元)。中共國內生產毛額目前為俄羅斯的10倍、大約是印度的5倍(2015年名目條件中共比印度富足4.66倍，購買力平價亦達2.20倍)，甚至比東協十國的國內生產毛額總值還高4倍。這點似乎終於讓美國的「修昔底德學派人士」開始感到憂慮。以南海議題為例，中共直接挑戰東南亞各國

的海洋主權聲索(特別是越南和菲律賓)，這點自國民黨政權於1947年公布其「牛舌線」(編按：即十一段線)地圖，宣稱擁有南海90%主權後就不曾發生過。但美國的立場原本一直保持嚴格中立態度，只表達希望調停爭端卻拒絕直接涉入，因為其並未擁有南海的任何主權。中共在1974年和1988年與越南爆發海戰而取得西沙群島實質控制權後，華府始終未曾表達反對，也未抗議中共於1994至1995年間私下占領位於菲律賓專屬經濟海域內的美濟礁。<sup>10</sup> 不過美國從2010年起開始積極表達反對態度，可是看在北京當局眼裡卻是鼓勵當地各國反抗中共試圖確立對黃岩島主權之作為，同時美國還(以非正式手段)支持馬尼拉當局向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仲裁法庭提出



訴訟，更讓中共十分惱火。中共的行為或許並未大幅變動到需要華府採取如此反制動作。自2015年起，美國開始轉為在中共以其人工島礁所劃設之專屬經濟海域範圍內實施「航行自由權」，完全不理會中共的警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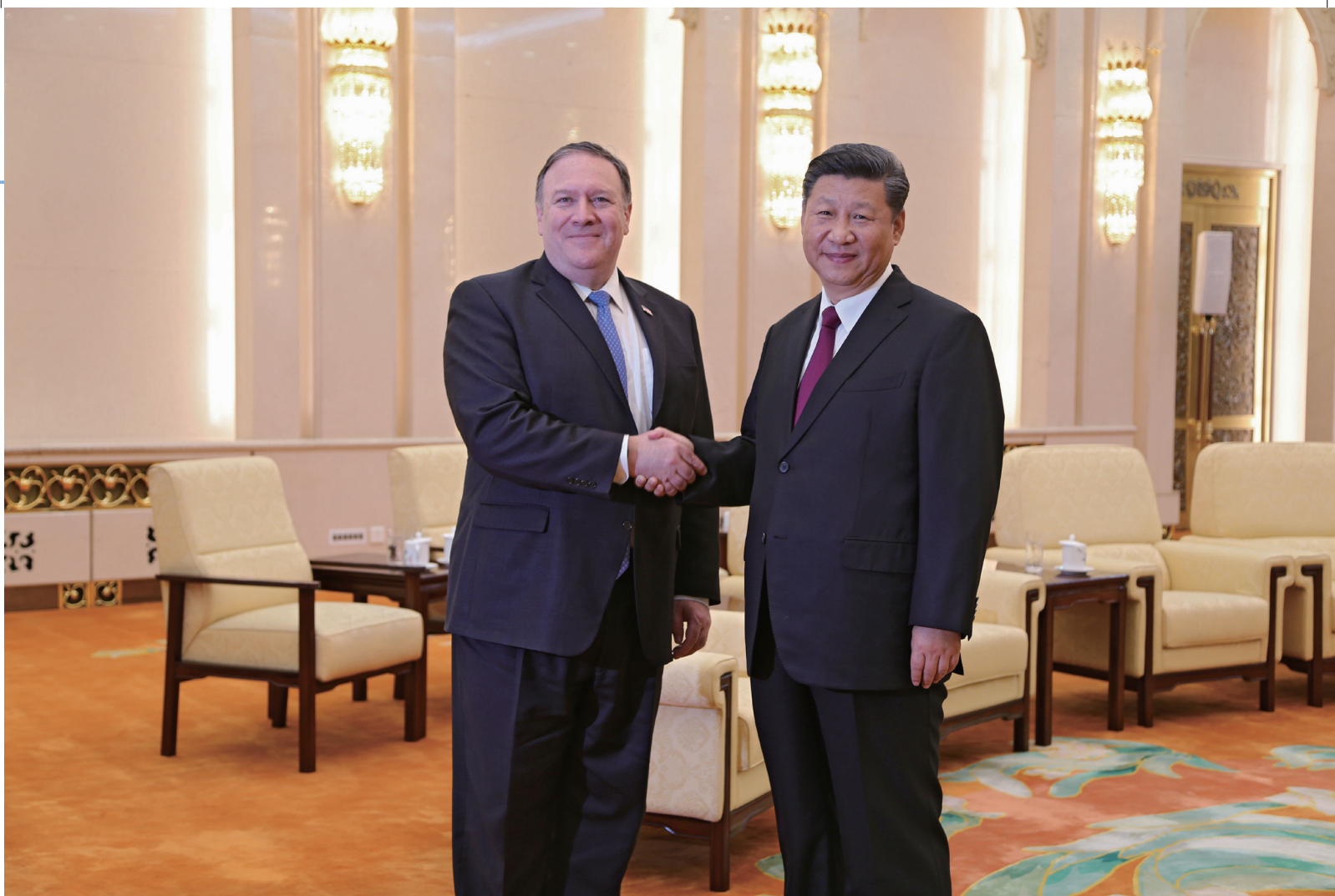
第二個導致美「中」關係分歧的必然原因是「迥異發展軌跡」。近期的心理研究顯示，在促進信任方面的決定性因素上，諸如身分認同等認知性因素，其重要性遠勝於成本利益分析；例如人們會信任那些自己認同的人。<sup>11</sup> 中共驚人的崛起方式確實相當符合權力轉移想定，但即使如此，艾利森認為這只是有可能導致雙方走向戰爭而已。近代和平權力轉移最明顯的例證就是英國將世界霸權轉移給美國。美國國內生產毛額在十九世紀交替之際超越英國，但其發展軌跡並未與大英帝國不同，亦未挑戰英國的霸權地位。相反地，美國還在兩次的世界大戰期間採取決定性手段介入以支持英國，同時在取代英國多年之後仍與其保持「特殊關係」。即使在1945年之

後已明確取得霸權地位，美國也很少偏離盎格魯·薩克遜共同體的立場。<sup>12</sup>

雖然目前有一派人士在回顧歷史時，認為中共和美國的發展軌跡從一開始就已截然不同，但這只是一種完全直覺性簡化某種高度不可預期之作法，就像是「摸著石頭過河」。中共「改革開放」政策開啟了一段廣泛思想與經濟創新的時代，就如同中共經濟學家蘇紹智於1979年所言，中共當年仍處於「社會主義的初期階段」，因此諸如市場等資本主義特徵仍僅具功能性而已。北京當局曾非常技巧性的表述(尤其是在1981年6月的第十一屆六中全會中通過的「黨史決議案」)，毛澤東強調極端平等集體主義雖然造成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但只是一個須進行基本方向調整的錯誤轉折，就可確保共黨生存。當時外來制度引進是在極端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背景之下，旨在恢復穩定的官僚體系威權統治而已。鄧小平在當時的多次演說中，強調「責任制度」必須配合基層的行政與會計權力下授。此舉激勵了大量

新興企業體應運而生，即鄉鎮企業，這有一部分是各級政府擁有或支持的企業體，而這些政府部門的利益則是來自稅收增加和地方就業率提高。一般來說，這些企業的創辦人都會有一位退休政府官員，其對於提供協助之政府機關仍擁有相當大的殘存控制權。此種誘因效果十分顯著，故而鄉鎮企業的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十多年來都超過資本較雄厚的國營企業。此種效應隨著各級幹部在1990年代初期的再次改革過程中，被容許離開政府職務並「下海」後變得更加明顯，例如這些退休官員可以全職加入這些地方創投企業，獲得的薪資往往高於公職。

儘管這項創新作為是依據鄧小平指導，扭轉中共社會主義思想造成生產力倒退的主要矛盾問題，但其政治制度亦同步進行改革，期待讓制度能與經濟自由主義相容。於是人員招募和晉升的重點從過去「又紅又專」轉變成世俗性的專業能力，因而促成了幹部訓練班隊的大量設立，同時也引進服務年限和任期限制，以遏止老人



中共經濟改革在習近平掌權後持續進行，但其發展軌跡以從市場自由化，轉向「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圖為中共主席習近平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之會面。(Source: State Department)

政治特徵延續。共黨雖然仍維持「一黨專政」的領導地位，但由於對效率日益重視而促成了專業分工，最終引發1987年第十三屆全國黨代表大會中要求「黨政分開」和「政企分開」的呼聲，甚至還提出了建立獨立文官制度計畫。在中共外交事務方面，改革開放作為強調和平發展，爭取所有對於中共現代化有益的國家支持。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及後續鎮壓發生後，類似更為積極的改革作為陷於退縮或停滯，同時使政治改革延後。但江澤民後來重新界定中共為「執政黨」（而非革命黨），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廣大群眾的利益」，以及典型的無產階級。

在天安門事件震撼後的初步倒退後，鄧小平在其1992年「南巡」時仍不顧菁英階層反對，宣布

持續推動經濟改革。但政治上的改革作為則必須從全民參與，轉為以恢復集權和提升行政效率為重點。一方面，價格市場化(零售層級)在1990年代初期迅速完成，同時在1997年第十五屆全國黨代表大會後開始積極推動私有化：城鎮住宅在即便沒有第二私有住宅市場的情況下也完成了私有化、共軍民營事業體也完成私有化，以及在「抓大放小」的口號下，放手讓中小型國營企業進行管理階層收購、併購或強制破產。另一方面，政治權力下授則遭到嚴厲制止：原本在1983至1984年實施的「一下」改革已將中央組織機關直接掌握的幹部減少三分之二，但共產黨在1990年又改採「二下」制度，提出新的幹部職務名稱表(nomenklatura)清單，增加了主要清單(直接由中央任命職



務)和次要清單(經報備中央後核定)之幹部人數。金融機關和稅務體系也集中掌握，其中四家國營商業銀行都收歸負責制定利息和匯率的「中國人民銀行」管轄。黨政分離在新的「一元化」和「建黨於政」原則下幾乎完全停止。原本強調的功能分工也被功能整合所取代。不過中共仍然加速向外在世界打開大門：假定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仍是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一環，中共與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經濟互動也應被容許，並使中共透過貿易、合資企業、多國資本企業對中國大陸的民間投資、甚至外國直接投資等方面不斷融入全球市場。此種結合融入資本主義經濟和市場開放的方式，對於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輿論是一大鼓舞，促成了所謂意識形態聚合的理論。但其亦對共黨意識形態正當性造成潛在破壞的不預期效應。初期階段理論成功使中共公開承認文化大革命的失敗，而兩者的對比則更是明顯：文化大革命代表社會主義理想(只不過太早實施罷了)，但在經濟方面是完全失敗，而改革開放雖然

在經濟面向上獲得成功，但卻代表共黨思想的倒退。回顧過去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雖已到達即將澈底轉為共產主義的門檻，而現今卻退縮回社會主義的初期階段。此種導致所謂「信念危機」的討論。中共經濟雖在胡錦濤時代蓬勃發展，除了2009年因全球金融風暴短暫下滑，其餘均保持每年近10%的成長率，但外界認為其改革動作基本上完全停滯。

中共經濟改革在習近平掌權後持續進行，但其發展軌跡已經從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市場自由化，轉向「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胡錦濤時代的混合型模糊論述已被中共重新強調的社會主義認同所取代。但若將此種改變界定為是回歸毛澤東思想，某種程度上並不正確。口頭上強調意識形態正統思想和個人崇拜是毛澤東思想的特徵，一如其所抱持之全球野心，但習近平的經濟模式似乎是一種複合體，混合列寧主義思想(其強調黨必須控制「指揮高度」)與過去高成長東亞各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發展模式，後者中的日本和南韓尤其

是中共經濟學家深入研究的對象。<sup>13</sup> 習近平在2012年時曾被捧成是充滿潛力的改革者，但當時究竟那種改革才真正必要卻仍充滿爭議。在2013年秋天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提出了一系列野心勃勃的改革措施，希望讓市場成為資源分配的「決定性」標竿，同時確保政府機關的「指導」角色。但街坊流言卻傳出習近平本人對於三中全會中所臚列的60項新改革措施興致缺缺，而是將此事授權劉鶴等專家處理，只要求這些改革措施不能影響政府機關或削弱共黨地位就逕行簽署。<sup>14</sup>

在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中，政府機關的指導地位顯然對各項市場改革作為造成負面影響。<sup>15</sup> 官方宣傳口號「民進國退」被民間改寫成「國進民退」。<sup>16</sup> 原因在於跟企業界既得利益脫不了關係，以及或許也因為習近平自己認為計畫經濟(command economy)時代已經來臨(這點由其處理2015年股市劇烈震盪的慌亂反應即可看出)。朱鎔基推動企業民營化曾招致外界批評，「管理階層收

購」是犧牲勞工圖利幹部，因此中共轉而採取改革措施，而非關閉那些造成虧損的(殭屍)國營企業。從胡錦濤時代起，北京當局開始更明顯地插手經濟事務，而國營企業的數目實際上也增加了。<sup>17</sup> 中共在2000年代中期選定了產業經濟體中的所謂「戰略」項目，這些經營企業在資金獲得與原料取得管道享有特權，並排除在市場競爭體系之外。上述公司都是2009年經濟刺激配套方案的主要受益者，同時還容許其在全球各股市掛牌，而某些國營企業(例如「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國家電網公司」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等)甚至在2010年代初期還排名全世界最大的企業集團。但國營企業的諸多弊病很快就浮上檯面。由於這些企業的過度生產，導致鐵、鋁及其他商品的全球過剩，其利潤大幅落後於民營企業，而還造成政府必須負責清償債務。但習近平仍選擇改革而非淘汰這些企業，甚至還設法在多個方面擴張國營企業部門：習氏持續對國營企業提供貸款作為財務刺激手段，透過興建基礎設

施維持6%的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一個從2012年到第十八屆全國黨代表大會都列為優先的主題，也是2015年的另一個重要工作)，鼓勵國營企業併購和民間募股，鼓勵大型國營企業「走出去」並到海外投資；最後則是主要針對推動國營企業投資基礎設施工程的一帶一路計畫。習近平在共黨第十九屆全國黨代表大會(2017年11月)和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2018年3月)後權力已獲得鞏固，其不但沒有推動改革目標，反而選擇進一步加強政府主導的經濟成長作為。

「習近平思想」的實質內容詳述於其「14點基本政策」。<sup>18</sup> 本質為共黨必須直接管控所有其他階級(如其中第1、11和14點所述)。如習氏所言，「共黨的領導是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特點。從黨、政、軍、民、學；到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此舉隨即於2018年3月帶來了全面性的體制面震撼。黨國也必須控制民營企業的宣示，更造成驚人的大量資金外逃潮。「習近平思想」強調北京當局有權收購民營公司股票和

在較大型民營和外資企業的董事會安插黨委會的席次，此舉已實質造成公部門和民營企業界線的模糊。<sup>19</sup> 當民營企業集團規模過大、負債過多或自主性過高時，就可能遭到以下措施強迫關閉：(1)「指示」轉投資，(2)依規定接管(例如「安邦保險集團」、「海航集團公司」等)，或是(3)行政「指導」(例如2016年前「中國華信能源公司」董事長葉簡明失蹤案，該公司曾列名全球500大企業的第229名，但卻負債累累)。

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具有理性目的之體系，其邏輯與內在紀律都完全符合所追求之目的。習近平藉由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夢」等兩個冠冕堂皇之目的團結整個國家，使其在內政方面的合法地位更形鞏固。習近平在第十八屆全國黨代表大會中提出的「新常態」論述，最後限縮到在第十九屆全國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僅出現一次。目的在邏輯上會衍生出規劃。全國計畫也因此再次獲得重視——五年計畫持續採用，只是現在使用的名詞是「規劃」而非「計



畫」，但其落實的積極度則完全相同，<sup>20</sup> 包含訂定年度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目標等。<sup>21</sup> 中共「十三五規劃」(2016至2020年)最引人注目之項目就是開始推動野心勃勃的「中國製造2025」計畫，希望在未來數十年內將中國大陸轉型為機器人、人工智慧、量子運算、極音速巡弋飛彈和新能源車輛等各種高科技產品的製造基地。身為「世界工廠」的中共，不早已是工業驅動力來源嗎？中國大陸目前生產的鐵、鋁、玻璃和水泥數量已超過世界其他所有國家的總和。但實情並非如此，中共因為過於依賴進口關鍵零件、組件和生產設備，而降低其產業獲利。北京當局注意到，雖然中共是世界最大的出口者，但其在供應鏈分工角色上卻往往侷限於相對低附加價值的組裝等工作，諸如蘋果的iPhone手機就是最顯著例證。因此，雖然中國大陸在機器人生產數量上領先全世界，但卻有高達75%高精度擺線減速機、80%小型馬達及80%控制器仍仰賴進口。關鍵組件如汽車變速箱等項目的進口數量也大幅增加。資訊

科技產品貿易赤字從2011年的1,376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933 億美元。中共希望在生產網路上取得更大地盤，以打造一條「紅色供應鏈」。<sup>22</sup> 習近平表示，「現代科技是現代國家的精銳武器」，所以決心透過新興工業國家模式的工業政策達成此一目標。更因此希望中國大陸供應商在「基本核心組件和重要基本原料」方面的內需市場占有率，能在2025年時提升至70%。「中國製造2025」是一項追求先進科技發展的遠程戰略計畫，希望達到「自給自足」的目標，其律定了三階段沒有限制的目標：第一階段(2015至2025年)、第二階段(2025至2035年)、第三階段(2035至2045年)。強調自給自足的部分原因，無疑是由於中共非常擔心像亞洲金融風暴和全球金融風暴等市場災難會再度發生(中國大陸股市事實上在2008和2015年兩度遭遇崩盤)，但另一方面也是基於民族主義的驕傲。誠如習近平於2018年馬克思200歲冥誕紀念活動的演說中所言：「從人類文明的過往成就學習不等於照搬照抄。

中共的發展不是模仿西方之發展模式，更不是走西方的老路。」<sup>23</sup> 須知道，此種野心勃勃的模式在川普發動貿易戰之前就已遭遇財政上的窒礙：中共因為2009年的紓困配套方案背負了5,860億美元的龐大債務，而國債增加速度也仍持續超越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中國大陸重工業的龐大產能過剩問題，不僅導致產品價格下滑，更導致對外貿易摩擦惡化，而「中國製造2025」計畫將改變目前相輔相成結構，並轉變為相互競爭的前景，也讓其他已開發國家貿易夥伴十分惱怒。但中共高層卻似乎仍然信心滿滿地堅持推動。

### 結語

中共的核心身分認同仍是「社會主義者」。這點向來無可否認，只不過其在改革開放初期曾加以淡化，而中共於此一期間則是強調其身分為開發中國家。隨著中共躋身強權之列，其愈來愈敢於表達自己特有的社會主義身分，甚至還一再向其他開發中國家推銷此一理念，並凸顯對立的「華盛頓共識」

所存在之諸多缺陷。<sup>24</sup> 中共認為對內有必要採取此一舉措，以遏制中國大陸百姓對於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認同。此種背景身分認同的重申讓中共發展模式朝著更接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因而促成了更具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貿易政策，因為經濟利益屬於中共黨國體系而非企業。此種作法對經濟互動帶來了排斥效果，因為外國經濟行為者開始認為中國大陸企業已經變成代表集體利益，而非個人或企業利益，而預期陸企也同樣會如此看待自己——即便其為外國公民，但應該也會認同中共。隨著日益獨特的中共身分認同出現及其跟他國身分認同落差漸大，適用圈內和圈外對象的基準規則也出現分野，導致政府之間的信任跟著消失。此種抱持主觀社會主義身分認同的情況隨著中共經濟與外交成果擴大而不斷加強，因此可預期未來若是中共繼續獲得此等方面的成功，其仍將持續發展和擴大。當然，這點幾乎不會無可改變，因為人們已見識到中共在發展過程中一向對身分認同採取相當務實且投

機的作為。民族認同多年來已證明具有強大的韌性，只不過其內涵變化很大；因此可預期中共仍會在成功時鞏固並強調此一身分，但挫敗時則隨機調整。

未來何處去呢？本文將當前美「中」關係低潮歸究於兩大因素，其一是權力政治問題，其二是各項認知問題，兩者皆必然且足以導致當前的對立局面。情況還會惡化到什麼程度呢？就權力政治面向上，由於中共以審慎考量風險的方式在經濟與領土議題上不斷向外擴張，美「中」之間已暗中開始進行軍備競賽，這與過去美國和蘇聯的戰略競爭相比，仍是屬於較有限的軍備競賽，因為雙方都無意陷入核戰或認為有發生核戰的可能性。截至目前為止，這場軍備競賽僅限於「反介入/區域拒止」戰力範圍；例如，中共所整建的戰力只是為了阻止美國出手保衛其盟邦安全或介入其模糊界定的東亞勢力範圍。此種情況的延伸邏輯是海軍艦艇和航空器的低規格對峙狀況再度出現，以及發生類似2001年EP-3撞機事件等狀況的危險

性，因而潛藏情勢升高的風險。中共確實已建立全球供應鏈，而且愈來愈有必要發展海空兵力投射戰力以確保該供應鏈安全；因此可想像美「中」摩擦將會逐漸擴大到印度洋和太平洋以外地區，但在可預見未來仍不太可能爆發戰爭。美國戰略思想家更為憂心的其實是中共戰略的政治經濟面向。一帶一路計畫不僅有可能讓中共獲得吉布地以外的基地，同時也讓某些財務困窘的參與者陷入債務陷阱，因為該計畫是由具商業利息的貸款所組成，而非無償金援。例如，截至2017年6月，緬甸和馬爾地夫的國債分別有44%和70%是向中共借貸，而肯亞的外債中亦有70%屬於中共。（此類資訊多數都未公諸於世，一如寮國和越南）。在斯里蘭卡，雙方償債協議是將該國漢班托塔(Hambantota)港的控制權轉讓中共九十九年。針對此類個案，人們可能會認為是間接衝突而非直接衝突，因為其涉及爭取第三方國家的效忠。但就這方面權力轉移理論仍然適用，因為若中共認定其在這場全球競爭中已處於主宰



地位，某種程度上必然引起美國方面的深度焦慮。

如果文中所推論的軌跡分歧動態模式正確的話，中共只要認為自己獲得成功，就會持續保持分歧發展路線，而似乎在面臨失敗時才會做調整。(諸如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作法)中共目前「強勢的」意識形態復興運動，有相

當大成分反應出自我意識覺醒，因為從北京奧運會後，中共國內生產毛額超越日本，接著是習近平掌權，都是導致此一運動「出現」的權力政治影響因素。目前美「中」貿易戰某種程度上顯現美國對於中共復興思想出現及其推動此一運動的焦慮。雙方當前用以牙還牙的關稅報復舉措將對彼此經濟造成損害，但最後何者受害最大仍有待

### 註釋

1. See Elizabeth C. Economy, *The Third Revolution: Xi Jinping and the New Chines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and Suisheng Zhao, ed., *China and US Relations Transform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2. 詳見習近平於「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演說內容。2014年5月20至21日，[http://www.china.org.cn/world/node\\_7206254.htm](http://www.china.org.cn/world/node_7206254.htm)
3. 戴維森(Philip Davidson，現任美國駐澳大使)上將向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進行書面聽證，刊載於2018年4月24日《亞洲時代雜誌》(*Asia Times*)。 <http://www.atimes.com/article/short-war-china-already-controls-south-china-sea-us-admiral/>
4. 中共2018年1至7月的美國貿易順差擴大至1,616.3億美元，2017年同期為1,427.5億美元。
5. 2017年，外商公司數量僅占所有中國大陸企業3%以下，但卻占有中共對外貿易量的50%以上、產生25%利潤及20%稅收；私營與外國投資企業則分別占中共對外貿易順差的46.5%和43.2%，而國營企業則僅占10.3%。
6. 外商公司撤出中國大陸的四大理由包含：房市泡沫化、營運成本增加、利潤縮減，以及人民幣貶值。
7. 2011年，中共的海外投資金額為600.7億美元，2016年則高達1,700億美元。
8. Richard Wike, “Americans’ Views of China Improve as Economic Concerns Ease,”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4, 2017 accessed at <http://www.pewglobal.org/2017/04/04/americans-views-of-china-improve-as-economic-concerns-ease/>. 須在此說明的是不同民調資料有著許多不同令人混淆的數字。See also Craig Kafura, “Washington Has Turned on China. Have Americans?” *Pacific Forum*, July 31, 2018 accessed at [https://mail.google.com/mail/u/0/#advanced-search/subset=all&has=china-us&within=1d&sizeoperator=s\\_sl&sizeunit=s\\_smb&query=china-us/164f08810a7aa034](https://mail.google.com/mail/u/0/#advanced-search/subset=all&has=china-us&within=1d&sizeoperator=s_sl&sizeunit=s_smb&query=china-us/164f08810a7aa034)
9.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17).
10. 菲律賓政府在1992年決心將蘇比克灣美海軍基地和克拉克空軍基地收回，而美國也立即撤出所有美軍官兵眷屬，以利這些地產的商業化。
11. Benjamin Barton,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Politics of Security Engagement: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Africa* (NY: Routledge, 2018), pp. 9-27.
12. 其中一個目前仍有爭議的轉折點，是美國在1957年11月干預蘇伊士運河危機，當時美國強迫英國和法國(兩國與以色列同盟)在1956年7月於埃及將該運河國有化後終止兩國軍事占領。
13. Sebastian Heilmann & Lea Shih, “The Rise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China, 1978-2012,”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3.
14. David Zweig, “Xi Jinping has consolidated power, but China is still waiting for the promised waves of refor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5, 2018, <http://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2138140/xi-jinping-has-consolidated-power-china-still-waiting>
15.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Economic Reform Score-

觀察。但由於任何一方退縮均有其象徵性影響，此種情況有可能還會持續相當時日。這場競爭的合理結果不會是核戰甚或傳統戰爭(除非意外事件或誤判情勢)，因為雙方在此一面向上均極度謹慎；但更有可能的發展是漸漸從目前的「涼戰」(cool war)升級為真正的「冷戰」(cold war)，一如過去長期的美蘇衝突。換言之，貿易戰會造

成兩個敵對自給自足經濟集團的形成，因為這場全球極化的再現將迫使其他國家(歐盟、非洲、拉丁美洲)必須選邊站。

#### 作者簡介

Lowell Dittmer係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學教授。

Reprint from *The Asan Forum* with permission.

- card,” *China Business Review*, March 7, 2016, <https://www.chinabusinessreview.com/economic-reform-score-card>
16. 「國進民退」政策(逆轉了鄧小平時期的擴大市場導向政策)的背景係受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衝擊，復受亞洲金融危機(1997至1999年)造成全球市場動盪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而進一步加強，中共在這兩次危機都比周邊市場化鄰邦存活的更好。
  17. 中共國營企業數目從2000年的19萬1,000家，減少為2007年的11萬2,000家，但此一數字在全球金融危機紓困方案後又再度增加：2011年為13萬6,000家、2012年為14萬7,000家、2013年為15萬5,000家、2015年為16萬7,000家。
  18. 「確保共黨對中共所有形式工作的領導；黨應採取以人民為中心的作法追求群眾利益。維持『全面深化改革』。採取基於科學和『創新、協作、綠色、開放和共享開發』原則的新發展理念。恪守『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人民當家作主』原則。以法治管理中國大陸。『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包含馬克思思想、共產主義和『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善人民生活與福祉為發展主要目的』。藉由『節能與環保』政策與大自然共存，同時貢獻全球生態安全』。加強國家安全。共黨必須擁有對共軍的『絕對領導』。宣揚港澳的『一國兩制』以追求未來『全面國家統一』，在臺灣問題上堅守『一個中國』政策及『九二共識』。奠定中國大陸人民和世界其他民族的共同命運以追求『和平國際環境』。加強共黨黨紀。」
  19. Lucy Hornby, “Communist Party Asserts Control over China Inc,”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3,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29ee1750-a42a-11e7-9e4f-7f5e6a7c98a2> 據中共官媒指出，中國大陸總共有186萬家民營公司，其中70%設有共黨小組或分部。
  20. 北京當局在近年的記憶中只有一年沒有達到設定之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目標，2014年略低於預設數字。
  21. See Sebastian Heilmann & Oliver Melton, “The Reinvention of Developmental Planning in China, 1993-2012.” Also see Barry Naughton, “The Return of Planning in China: Comment on Heilmann-Melton and Hu Angang,” *Modern China*, Special issue, Vol. 39, No. 6 (November 2016), pp. 560-628 and 640-652, respectively.
  22. See Douglas B. Fuller, *Paper Tigers, Hidden Dragons: Firm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3. Chen Shuguang, “Shizhong buyu jianchi he fazhan Makesizhuyi,” *Renmin ribao*, May 14, 2018,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514/c40531-29985388.html>
  24. 近年針對民族認同最深入的分析詳見 Gilbert Rozman,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Bilateral Relations: Widening Gaps in East Asia and Chinese Demo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12); G. Rozman, *East Asian National Identities: Common Roots and Chinese Exception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12); see also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